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水平的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我国 106 个城市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李荣彬 袁 城 王国宏 王 领

摘要:本文利用全国 106 个城市的动态监测数据,对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水平进行测量,结果发现,目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水平为 50.18%,已经达到了“半”市民化水平。在此基础上,通过运用定量模型及定性资料分析了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因素,回归结果显示:经济因素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而个体特征、社会归属感及社区参与维度也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水平的显著因素。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 市民化 社会归属感 社区参与

一、研究背景

农民工市民化是指农民工克服各种制度阻碍和身份限制最终实现市民化的过程和现象,它不仅要求在身份上与城市居民获得相同的合法身份与平等的社会权利,而且也表现为农民工在价值观念、情感融入、身份认同、政治参与等方面以及与城市市民在生产、生活方式逐渐趋同的过程(王桂新等,2010)。发展经济学经典理论在关注发展中国家城乡人口迁移和市民化过程中提出了“农村人口城市化”和“农业剩余非农化”的概念,并指出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这两种现象是同时发生,合二为一的,即农民由乡村迁移到城市的瞬间即伴随着其自身实现市民化的过程。

但是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格局的存在以及计划经济制度的严格执行,使得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呈现出与市场经济国家迥然不同的“中国路径”(刘传江,2006),即在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明显存在着“二元路径”:第一阶段,大量的劳动力从农村迁入城市,实现空间和职业的双重转变,由农民转变成农民工。然而由于缺乏城市户籍,他们只能作为一个“弱势群体”生活在城市的边缘性领域及空间里,呈现出“迁移但不融入”的状态;第二阶段,由于农民工价值观念、生活习惯、行为方式的融入及自身素质的提高,他们从以前在非正规部门就业的临时工转变成在城市正规部门就业的产业工人,并在心理层面对城市产生一种高度的认同感,最终实现身份由农民工向市民的转化。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农民涌入城市并积极融入其中,然而,制度性障碍的存在,使得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举步维艰,换句话说,农民工进入城市,并不代表他们已经实现了市民身份的转变。

现有的研究表明:城市农民工并没有顺利实现市民化,他们的城市适应水平较低,处于城市的边缘化地位,并“沉淀”为“外来边缘人口”,绝大多数农民工处于一种“半城市化”、甚至是一种“虚城市化”的状态,这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和城镇化发展的“巨大瓶颈”(张斐,2011)。

二、文献综述与评述

近年来,学术界从不同的视角和维度对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这些研究主要围绕着农民—农民工—市民的二元路径展开,其主要观点认为农民工市民化就是农民从传统向现代、从乡土向城市、从封闭向开放转变以及由此获得现代性特征的过程。具体的表现为由于生活技能、社会规范、个性气质等方面的再社会化促使农民工的工作职业、社会身份发生彻底改变,致使其在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与城市市民趋同,并最终适应城市社会的规则与逻辑的现象(李培林,1996;马雪

松,2007)。与此同时,有些学者从现代化、社会网络与制度主义出发,对农民工市民化的机理进行了分析和阐释。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以下三种观点:其一,现代化理论分析路径,这种理论通常把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理解为由于农民工个人价值实现和人生状态提升的需要——他们不断摒弃原有的乡土性,朝着现代化的方向发展,进而获得城市性的过程。在这种理论分析范式下,由于农民工的群体素质、人力资本和群体特性等不符合城市现代性的要求,因此他们在城市融入的过程中,经常会陷入角色中断和行为失败的困境。其二,社会网络分析路径,这一理论倾向于从农民工所拥有或卷入的社会资本、社会关系网络等方面对市民化现象进行阐述,指出社会资本、社会关系网络与占有的社会资源对农民工市民化起着决定的作用。其三,制度主义分析路径,这种理论在承认现代性、社会资本与社会关系网络的前提下试图在更为宏观的制度层面对农民工市民化的机制进行阐释。由于我国特有的社会体制结构、相关制度安排以及具体的制度实践,使得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呈现出明显不同于发达国家的二元路径,并且对我国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但是现有的研究带有明显的传统——现代程式的结构主义特征,其基于社会关系网络、制度安排、社会资本的视角对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出现的诸如互动、冲突、竞争及策略性融入等现象进行深入分析,突出了结构性要素对市民化的作用。它所强调的无论是经济融入、政治参与、行为适应还是心理认同,其在实质上还是一种社会——结构性的嵌入型融入。由此可见,我国学术界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路径和融入机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是有关市民化水平、发展进程及影响因素的研究仍然不足,至今未能得出一致的研究结论。基于此,笔者将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水平及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进行简要梳理。

目前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水平测量的研究仍显不足,基于不同研究视角所构建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指标体系也不尽相同,因此测出的市民化水平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包括如下:王桂新等人通过构建农民工市民化指标体系,对农民工群体的市民化水平进行了测量,指出我国总的市民化水平为54%,并且社会关系、心理认同等指标的市民化水平都已达到或接近60%,而政治参与维度的市民化水平最低,仅为34.8%(王桂新等,2008);刘传江通过构建个人素质、收入水平、城市中的居住时间和自我认同这四个指标,最终测得武汉市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水平为50.23%(刘传江、程建林,2008),此外,他通过采用层次分析法,分别从生存职业、社会身份、自身素质、意识行为四个方面进行指标体系设计,测出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水平为45.53%,比第一代农民工的市民化程度提高了3.5%,并且利用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对农民工市民化程度进行了评价(刘传江等,2009:112-126);此外徐建玲通过对外部性制度因素的影响程度、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和市民化能力进行测量,计算出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水平为50%左右(徐建玲,2008);张斐基于全国性的调查数据,指出整个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市民化水平达到了45%,其中有六成以上的人市民化程度超过了40%,处于中等市民化阶段(张斐,2011);而任娟娟则通过构建刚性维度(经济生活、政治参与)和柔性维度(社会交往、文化心理)对西安市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水平进行测量,认为西安市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程度总体偏低,未达到“半”市民化或中市民化水平,而且维度之间发展很不平衡(任娟娟,2012)。

与此同时,有些学者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口学的视角出发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研究,大多数研究表明:性别、教育程度、培训状况、工龄、个人技能等个人能力要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有一定的影响。此外,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状况、居住环境、收入水平、务农经验、对城市的归属感及身份认同等也是与其市民化进程密切相关的重要解释变量。如舒尔茨(Schwartz)认为教育程度较高有利于降低劳动力寻找工作的信息成本,使农民工更容易在劳动力市场上找到工作,从而增加就业的可能性(舒尔茨,1970:71-83);梅建明(2006)在对武汉市农民工进行调查后认为,工作稳定、城市的归属感高、收入合理、年龄较轻、文化程度较高者更愿意获得市民权,从而实现市民的转化,而王毅杰(2005)的分析表明:“社会经济地位”变量中的年龄、性别、文化程度、月收入、配偶居住情况和城市生活时间,社会网络连接两端“情感性关系”、“工具性关系”,显著影响着流动农民的留城定居意愿,另外,曾旭辉(2003)通过实证研究表明:教育程度也

会影响留城决策,但是其关系并不是线性的;配偶是居住在城市还是农村也会对农民工的市民化产生影响,但是父母和子女对其是否有影响,有待于进一步的实证分析。此外有学者基于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实际出发,指出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面临着一种制度性排斥。这种以户籍制度为核心包括社会保障制度、就业制度、福利分配制度及与其相关的一系列制度安排直接或间接地阻碍了新生代农民工在经济、社会、文化、心理等方面顺利实现市民化的途径,并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种“妖魔化”现象。而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素质偏低、社会资本不足和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等成为制约其市民化进程的主要障碍(李培林,2003:149-160)。户籍分割制度的存在严格的把我国分割成“农民”和“市民”两个阶层,并分别对其贴上标签,且界限明显,由此引发出农民工与城市市民在社会认同、社会整合关系及社会分配体系中的严格对立,进而形成社会的自我分层(陆益龙,2008)。此外,一个更为宏观的视角是基于农民工与市民在文化背景的差异化基础上展开的。这种观点认为由于乡土观念和社会记忆的存在,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之中,尽管他们能够接受城市的特性及生活理念,但是他们身上的“乡土性”不会立刻消失,相反会沉淀在他们的内心,并且在已有的乡土文化中重新构建自己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价值标准、政治意识及法制观念等(任娟娟,2012)。与此同时,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不只是一种“单向化”的市民化,其本质既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在经济、心理、身份上的自觉融入,也表现为城市市民对他们的理解与接纳,在双向的交流与互动、整合与融入的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工才能真正实现其身份向市民的转化。

通过对以往有关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水平及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进行整理后发现,现有研究存在着明显的不足:(1)大多数立足于宏观视角的理论分析,缺乏相关的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与现实情况往往存在较大的差距;(2)缺少对市民化水平测量的具体研究,加之缺少全国性的调查数据,至今未能得出一致的结论;(3)目前虽然有一些学者构建了农民工市民化指标体系,但是这些体系大多数都偏重某一个或几个方面,而缺乏对市民化进程的宏观把握,因此建立的指标体系缺乏科学性和合理性。针对已有研究的局限,本研究试图在全国性调查数据的基础上,通过构建新的市民化指标体系来测量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水平,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具体的探讨。

三、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的数据来源于2010年国家计生委组织的在流入地对流动人口进行的动态监测数据。本次调查主要采取重点抽样和多阶段与规模成比例抽样(PPS)相结合的方法,主要覆盖全国31个省(市、区)的106个城市,对在流入地居住一个月以上,年龄介于16-59岁之间的流动人口进行调查。调查的范围包括流动人口的基本人口信息、流动经历、就业状况、生活居住、返乡就业意愿及流动人口心理和社会融合等。根据本文研究的需要,笔者将新生代农民工定义为1980年以后出生的拥有农村户籍,并且曾经外出打工半年以上的农村流动人口。通过筛选和剔除,最终得到有效问卷49893份。

从表1可以看出,在性别方面,男性农民工所占的比例为44.7%,女性占55.3%。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24.43岁,其中21-25岁的人数最多,所占的比例为40.1%,26-30岁农民工所占的比例为39.8%,两者之和超过了80%。在受教育程度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8年,其中初中文化程度的人数最多,所占的比例为60.3%,拥有高中学历的人数占17.9%,而专科及以上学历的人数只占15.3%。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全部出生在1980年以后,所以年龄结构较轻,其中未婚的比例高达46.3%,几乎占总调查人数的一半。与此同时,接受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中来自中部的人数较多,其所占的比例为45.3%,而来自东部和西部的比例依次为29.5.9%和25.2%,他们主要以跨省流动为主,所占的比例超过七成,而市内跨县流动的人数最少,所占的比例不足5%。从进城时间来看,新生代农民工来本地平均工作时间为3.6年,其中来本地时间在1-3年的人数最多,所占的比例为65.1%,而时间在7年以上所占的比例只有14.6%。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均工资水平较高,人均月收入为1660元,其中有接近七成的人均收入集中在1000-3000元之间,

而月人均收入低于 1000 元或超过 4000 元的只占总人数的 10.9%。

表 1 新生代农民工基本特征统计表

变量名称	频次	百分比(%)	变量名称	频次	百分比(%)
性别			籍贯		
男	22282	44.7	东部	14701	29.5
女	27611	55.3	中部	22619	45.3
			西部	12573	25.2
年龄(岁)			流动范围		
16-20	10044	20.1	跨省流动	41966	73.5
21-25	19953	40.1	省内跨市	11110	22.3
26-30	19896	39.8	市内跨县	2099	4.2
教育程度			来本地时间(年)		
小学及以下	2924	6.4	1-3	32480	65.1
初中	30379	60.3	4-6	10121	20.3
高中	8940	17.9	7-9	4380	8.8
专科	7030	14.1	10年以上	2912	5.8
本科及以上学历	620	1.2			
婚姻			月收入(元)		
未婚	23102	46.3	1000以下	1596	3.2
在婚	26678	53.5	1000-2000	21803	43.7
离婚	111	0.2	2000-3000	17363	34.8
丧偶	2	0.01	3000-4000	5289	10.6
			4000以上	3482	7.7

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指标体系的构建及分析

(一)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指标体系的构建

农民工市民化的含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市民化”是指农民或外来移民与国家、政府和技术层面的融合,主要包括与城市居民获得相等的权利与实现身份的认同等;而广义的“市民化”则表现为农民工在融入的过程中,不断地接纳城市的现代文明,摒弃原有的乡土惯习,从而造成其在身份、地位、价值观、社会权利以及生产生活方式等各方面全面向城市市民的转化,以实现城市文明的社会变迁的过程。本文采用广义的“市民化”定义,按照系统性、简明性、易得性的原则对指标进行选取,一方面能够反映出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各个维度之间的区别和联系,从多方面表现“市民化”的层次和内涵;另一方面又能够使许多抽象、复杂的概念转变为简明、可比较、独立性、信息量大的指标,可以有效避免因指标体系过于繁杂而造成的操作不便甚至操作失灵,从而保证指标体系的可行性。因此本文选取经济生活、居住条件、政治参与、社会关系、心理认同五个维度来构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指标体系。本文采取综合指标法,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总体评价指标设定为 I,反映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实际距离。如果值为 0,则表示新生代农民工在身份上完全具有农民的特性;值为 1,则表示新生代农民工已经顺利实现市民化,其身份已经实现由农民向市民的转变。随即我们采用“领域平均权数”赋值法,对各个系统赋予相同的权重,同领域各指标也赋予相同的权数,这样不仅可以操作方便,也可以避免在设置权数时过于主观化(郎彦辉,2009),具体赋值情况见表 2。

表 2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市民化程度 $I = 1/5E + 1/5C + 1/5D + 1/5S + 1/5F$	经济生活 $E = 1/2E_1 + 1/2E_2$	职业状况 $E_1 = 1/2E_{11} + 1/2E_{12}$	您现在主要从事何种行业工作	E_{11}
			您目前在本地的就业状态是什么	E_{12}
		经济生活 $E_2 = 1/2E_{21} + 1/2E_{22}$	您过去一个月平均每天工作几小时	E_{21}
			经济收入(农民工人均收入/城市居民人均收入)	E_{22}
	居住条件 $C = 1/2C_1 + 1/2C_2$	住房条件 $C_1 = 1/2C_{11} + 1/2C_{12}$	您现在的住房属于下列何种性质	C_{11}
			您现在的住房里有哪些电器	C_{12}
		居住环境条件 C_2	您对目前的住房环境是否满意	C_2
	政治参与 $D = 1/2D_1 + 1/2D_2$	政治活动 $D_1 = 1/2D_{11} + 1/2D_{12}$	您是否参加过当地的社区选举	D_{11}
			您是否参加过当地举行的听证会	D_{12}
		与政府交往 D_2	您是否与本地政府打过交道	D_2
	社会关系 $S = 1/2S_1 + 1/2S_2$	人际关系 $S_1 = 1/2S_{11} + 1/2S_{12}$	您最愿意和哪些人交往	S_{11}
			您在生活上遇到困难时主要求助谁	S_{12}
		闲暇活动 S_2	您是否参加当地的文体活动	S_2
	心理认同 $F = 1/2F_1 + 1/2F_2$	情感认同程度 $F_1 = 1/2F_{11} + 1/2F_{12}$	您是否打算长期在本地居住	F_{11}
			您对本地生活方式的态度是	F_{12}
		身份认同程度 $F_2 = 1/2F_{21} + 1/2F_{22}$	您与当地是否谈得来	E_{22}
			您是否喜欢现在居住的城市	

从表 2 中可以看到,本文构建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指标体系主要包括 5 个一级指标、10 个二级指标和 17 个三级指标,其中经济生活、居住条件、社会关系维度主要测量新生代农民工外在的身份特征,反映其市民化的能力和努力;而政治参与和心理认同维度则体现着农民工内在的心理认同,只有实现了政治参与和心理认同才表明其真正的完成了市民化进程,并且各维度之间相互关联,体现着新生代农民工由农民—农民工—市民二元格局的转化路径。在经济生活层面,“每天工作时间”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产生重大的影响,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劳动者的每天最高工作时间不得超过 8 小时,因此新生代农民工每天的工作时间越是接近 8 小时,其市民化的程度就会越高;本指标体系中的经济收入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其含义是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人均工资收入与城市居民人均收入的比值,其值接近于 1,则表明其在经济收入层面已经实现了市民化;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工作类型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其社会地位的体现,因此在国家和社会公共部门及高技术行业从事工作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的市民化程度就会高,而那些从事体力劳动和无固定职业的劳动者,其市民化程度就会比较低。关于住房的假设,本文结合王桂新等人的做法并结合研究的实际需要,将自购房的市民化水平设定为 1,租房的权重设为 0.75,而在单位和亲戚朋友家居住,则其市民化水平为 0.5,而其他的设定为 0.25,本文通过查阅相关的文献,将住房里有电脑和空调的市民化程度设定为 0.75,将有电冰箱和洗衣机的设定为 0.5,而将有彩电的设定为 0.25,其他的设定为 0。社会关系能够反映出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人际关系网络的广度,良好的社会关系能够降低心理成本和信息成本,积累社会资本,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基于此,我们将困难时求助于本地人的市民化水平设定为 1,求助于当地政府部门和居委会的设定为 0.75,求助于同事和工作单位的设定为 0.5,求助于亲戚朋友的交往设定为 0.25,其他的设定为 0。然后,将三级指标加权汇总后合成二级指标,二级指标加权汇总后形成一级指标,一级指标加权汇总后形成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综合评价得分。

(二)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水平的综合测量结果

根据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指标体系,笔者对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水平进行了测算,从测算的结果(见表 3)可知,现阶段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呈现出如下特征:

表3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测量结果

农民工市民化程度	评价值	标准差	0.2 以下	0.2—0.4	0.4—0.6	0.6—0.8	0.8 以上
市民化程度(L)	50.18	——	13.9	23.4	24.2	25.1	13.4
经济生活(E)	53.38	1.79	9.6	22.9	29.8	19.8	17.9
居住条件(C)	59.33	3.02	0.7	14.4	34.6	47.5	2.8
政治参与(D)	32.35	4.22	42.6	25.4	2.1	19.8	10.1
社会关系(S)	54.45	2.07	9.4	18.6	31.3	26.2	14.5
心理认同(F)	42.58	2.76	16.1	35.4	23.4	12.3	12.8

首先,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已经达到了“半”市民化状态。研究表明:目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水平为 50.18%,即新生代农民工相对于城市居民而言已经达到了“半”市民化水平,具体而言,我国市民化水平达到 80% 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约有 13.4%,而在 60% 和 80% 之间的约有 25.1%,尚未达到“半”市民化水平的新生代农民工大约有 37.3%。由于传统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二元社会体制的存在,人为地把城乡分割成了两个难以逾越的社会阶层,从而限制了新生代农民工从农村进入城市,导致其市民化过程出现明显的农民—农民工—市民二元转化路径。在这种“排他性”和“歧视性”体制下,新生代农民工权利资本严重缺失,阻碍了其社会资本数量、质量与结构的拓展,造成预期收入和实际收入的下降,弱化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能力。与此同时,由于我国制度层面和系统层面长期不整合,在乡城之间又形成了一种“新二元结构”,成为一种坚固的结构性现象,并不断复制和强化,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在许多方面表现出趋于结构化、长期化和永久化的特征(王春光,2010)。

第二,虽然我国已经达到了“半”市民化水平,但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水平在各个维度之间却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其中,新生代农民工居住条件的市民化水平最高,已经达到 59.33%;而政治参与的市民化水平最低,仅为 33.41%;其余依次为社会关系、经济生活和心理认同,三者分别达到 54.45%、53.38% 和 42.58%。之所以出现这种差异,是因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不是单质的、同一的,其内部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这种内在的异质性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在市民化过程中呈现出不同的市民化状态。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他们会不断摒弃内在的“乡土”认同,努力适应城市,不断增加其外在的“城市”特性,这种不断增加的“城市性”有时会外化为与城市居民相似的居住条件、经济生活、价值观念和心理认同等。作为新生代农民工迁居城市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经济生活的市民化对其整体的市民化进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心理认同作为衡量新生代农民工是否真正实现市民化的重要标志,其市民化水平更能从本质上反映出现阶段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真实水平。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平等参与政治生活的主体,由于以国家权力为保证的制度性强加身份的存在,使得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并不能真正的参与城市的政治生活,这才是造成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市民化水平较低的根本原因。因此,提高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市民化水平,将是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水平的重要举措。

五、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变量选择

通过对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水平进行测量后发现: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总体上已经达到“半”市民化水平,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水平不仅在各个维度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而且同一维度内部的市民化水平也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因此,只有深入探究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原因,才能从根本上厘清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内在机制。

本文将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程度 L 设为因变量,选取个人特征、经济生活、城市归属感及社区参与等四个维度作为自变量,其中个体特征包括新生代农民工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就业状况和婚姻状况变量;经济生活维度则具体包括工资收入、每周工作时间,这三个变量都为连续变量,而在

未来一年内是否更换工作、签订合同、是否接受就业培训则为定距变量,分别赋值为 1 和 0;城市归属感中是否愿意融入本地为定距变量,而与单位关系、对本地的生活态度及生活满意度则可以看作连续变量,并分别对其进行赋值;最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区参与”维度则包含着三个变量,分别为日常交往状况、在困难时求助谁以及是否参加当地的社区选举,前两个同为连续变量,后者为定距变量,具体各个变量及赋值及分布状况见表 4。

表 4 变量的定义及样本基本描述性统计

自变量	变量定义	样本均值	标准差
个体特征			
性别	男性 = 1; 女性 = 0	0.55	0.497
年龄	定距变量	24.43	3.762
教育程度	小学及文盲 = 1; 初中 = 2; 高中 = 3; 中专及以上 = 4	3.33	0.992
就业状况	就业 = 1; 暂时失业 = 2; 从未就业 = 3	1.21	0.660
婚姻状况	已婚 = 1; 未婚 = 0	0.46	0.239
经济生活			
工资收入	定距变量	2457.66	4697.122
是否打算换工作	是 = 1; 否 = 0	0.79	0.410
每天工作时间	定距变量	9.55	1.848
是否签订合同	是 = 1; 否 = 0	0.76	0.355
是否接受培训	是 = 1; 否 = 0	0.62	0.416
城市归属感			
与单位关系	非常好 = 1; 比较好 = 2; 一般 = 3; 不太好 = 4; 非常不好 = 5	2.44	0.712
是否愿意融入本地	是 = 1; 否 = 0	0.83	0.559
对本地生活态度	喜欢, 完全接受 = 1; 认可, 接受一部分 = 2; 尊重, 不接受 = 3; 排斥 = 4	1.76	0.584
生活满意度	定距变量	6.46	1.480
社区参与			
日常交往情况	亲戚同乡 = 1; 邻居室友 = 2; 同事朋友 = 3; 老板雇主 = 4; 其他 = 5	1.84	0.374
困难求助谁	老乡朋友 = 1; 雇主单位 = 2; 当地政府组织 = 3; 新闻媒体 = 4; 其他 = 5	3.24	1.555
是否参与社区选举	是 = 1; 否 = 0	0.15	0.405

(二) 回归结果及分析

本文将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水平作为因变量,对影响其市民化水平的因素进行多元回归,采用 Logistic 统计模型下的逐步回归法,将个体特征、经济生活、城市归属感和社会参与四个维度逐步纳入模型之中进行分析。统计结果表明四个模型均通过了 F 的统计检验,整个回归模型的 R^2 达到了 0.42(见表 5),表明此次回归结果取得了良好的拟合效果,并且在一定的程度上说明了个体特征、经济生活、城市归属感和社会参与四个维度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水平有着重要的影响。

从新生代农民工个体特征来看,模型一中可调整的 R^2 仅为 0.11,这表明个体特征维度在总体上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较小。具体分析可知,性别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水平有着一定的影响,其回归系数为负值,这表明新生代农民工中男性的市民化水平要低于女性。统计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中女性群体实现市民化水平为 43.31%,而男性群体的这一比例仅为 34.15%,男性的市民化水平低于女性约 9 个百分点。并且在控制了相关变量的基础上,这一结果也十分显著。性别差异理论指出:女性在人际交往上往往要优于男性,此外,较之与男性,女性更愿意融入城市,并积极的从城市之中获取各种资源,积累社会资本,从而更好的适应城市(谢华,2009)。与此同时,女性具有不同于男性的心理素质,她们拥有强烈的团聚意识和陪伴需要,出于生活和婚姻安定的需要,她们更倾向于在一个城市中定居,而不是到处流动;而城市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会打破她们原本枯燥而单调的生存状态,使她们获得更多的城市体验,从而不断融入城市,以满足自我体验城市现

表 5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影响因素的回归模型

变量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个体特征				
性别	-0.144***	-0.138*	-0.124**	-0.127**
年龄	0.020***	0.014**	0.019*	0.012***
年龄的平方	-0.024**	-0.025**	-0.029**	0.027**
教育程度	-0.202*	-0.180*	-0.160*	-0.150*
就业状况	-0.157**	-0.028***	-0.021***	-0.062***
婚姻状况	-0.110**	-0.110*	-0.110*	-0.110*
经济生活				
工资收入		0.021*	0.106*	0.087**
是否更换工作		-0.442***	-0.392*	-0.391*
每天工作时间		0.064**	0.035***	0.015***
是否签订合同		-0.020***	-0.038*	-0.049*
是否接受培训		-0.370**	-0.237*	-0.146*
城市归属感				
与单位关系			0.574*	0.562*
是否愿意融入本地			0.021***	0.121**
对本地生活态度			0.011**	0.014*
生活满意度			0.295***	0.274*
社区参与				
日常交往情况				-0.124***
困难求助谁				-0.177**
是否参与社区选举				0.271*
调整后 R ²	0.11	0.31	0.36	0.42
Sig	0.000	0.000	0.000	0.000

代化生活方式的渴望。年龄对城市化水平呈现正向关系,其回归系数为 0.020,说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每增加 1 岁,其市民化水平就会提高 2%。随着年龄的不断增大,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水平也会不断提高,二者之间呈现正向关系。但是,当以年龄的平方项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的时候,其系数却是负数,这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水平可能会出现一个先增长后降低的变化趋势。换句话说,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水平随年龄增大而不断提高的情形会在通过某个时点后出现转折,并随着年龄的增加而不断下降,就总体而言,整个过程会呈现一个倒 U 形的变化曲线。在进一步的分析中,笔者发现教育程度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水平呈现负向的关系,这与以往的研究结论大不相同,这种看似相悖的结论并不妨碍我们对现实情形的解读。一般而言,具有较高素质的新生代农民进入城市之后,他们会找到比较满意的工作,经济收入也会比较高,从而会自觉地在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等方面不断的与城市的主流社会趋同,并希望能凭借这种方式真正实现身份的转化。然而由于社会屏蔽制度的存在,这种适应性的融入方式也不能满足其市民化的需求,他们在心理上只是把城市当作“他们的”,而不是“我们的”,认为自己的“根”在农村。如统计研究表明,拥有高中及大学学历的新生代农民工愿意融入当地城市的比例分别为 81.9% 和 80.6%,而拥有初中和小学学历的这一比例分别为 83.2% 和 82.1%。这一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面对着来自城市的强大压力,他们只能在“空间漂泊”和“心理漂泊”的双重状态下无奈而艰难的生活,成为“高素质民工”。再加上他们在社会交往和社区参与的过程中常常被歧视和排斥,这样更会增加他们对城市的憎恶感,进而会影响他们的市民化进程。与此同时,就业状况和婚姻状况这两个变量与市民化水平显现出反向关系,二者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0.157 和 -0.110,这表明未就业和未婚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水平分别比已就业和已婚的市民

化水平低 15.7% 和 11%，同时，也说明已经就业和已婚的农民工更有利于自身市民化的实现。就业作为新生代农民工立足城市的主要经济来源，其工作的好坏会直接关系到他们在城市的居留意愿，而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家庭”为核心的伦理观念，直接决定着他们在城市的行为方式，一旦结婚，他们便会倾向于选择在城市定居，与家人在一起共享天伦之乐，而不是到处流动，四处漂泊。

模型二中，由于加入了经济生活维度，整个模型的可调整 R^2 由原先的 0.11 增加到 0.31，这表明经济生活维度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水平起着关键的作用。作为“理性人”的新生代农民工，收入是他们进城的主要动力，因此资本积累的多寡无疑对他们的市民化意愿具有持久性和决定性的影响。这是因为经济资本能够为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奠定物质基础，如果缺乏经济资本积累，即使新生代农民工有千万个意愿想要实现市民化，但这只能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梦，经济资本的积累不仅为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城市提供了最基本的生存条件，而且也能为他们在城市中得到更好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罗遐,2012)。然而笔者发现虽然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对市民化水平的影响是正向的，但是却没有通过模型的检验。基于此，笔者认为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内部之间在经济资本积累、人力资本储蓄及社会关系网络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而那些高工作收入、高素质的新生代农民工对是否成为城市人并无多大的意愿，即使他们没有城市户口，享受不到城市提供的公共福利和社会保障，他们依然能够凭借自己较高的经济收入和人力资本，自如的在城市中生活；相反，那些经济收入水平较低，人力资本较低和社会关系网络较弱的新生代农民工，即使他们愿意在城市定居，但是较低的资本积累似乎就是一道无法跨越的屏障，阻碍他们市民化的进程，因此这种愿望只能是一种永恒的渴望，却无法真正实现。而每天工作时间的长短对市民化水平也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其回归的标准化系数为 0.064，这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工作时间每增加 1 小时，就可以使其市民化水平提高 6.4%。增加工作时间可以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经济收入水平，在无形之中增加其完成市民化的物质基础和社会资本。与此同时，研究结果表明，在未来一年内是否更换工作、是否签订劳动合同、是否接受技能培训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水平都起着反向作用，其回归的标准化系数为负值，这说明频繁的工作调动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新生代农民工如果在未来的一年打算更换工作，其市民化水平就会降低 44.2%。这表明工作次数的频繁调动不仅隔离了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的认知距离，而且也会在他们的心理沉淀一种“模糊化”的记忆和“似是而非”的错觉感，导致其内心的认同感会不断转化为外在的“抽象性”，从而造成新生代农民工的“被市民化”现象。而与企业签订合同和接受当地劳动部门或工会组织举行的职业技能培训，可以增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人力资本，提高劳动技能，能够为其不断的市民化进程提供持续的物质和人力资源保障，促进其市民化的最终完成。

模型三中，笔者在原有模型的基础上又加入了城市归属感维度，使得整个模型的 R^2 由模型二中的 0.31 增加到 0.36，模型的拟合度进一步提高，这表明城市归属感维度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水平有着一定的影响。在模型中，笔者发现，与单位关系的融洽程度对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水平的作用并不明显。也许对他们而言，单位仅仅只是一个工作的场所，面对居住的城市，他们更多的时间是在工作场所以外的地方度过，因此，新生代农民工与工作单位的关系是否融洽对其的市民化水平并没有多大影响。而“是否愿意融入本地”却通过了模型的检验，其标准化回归系数为 0.021，这表明新生代农民工越是愿意融入当地，其市民化的水平就会越高。新生代农民工愿意融入城市社会表明其已经努力并试图在心理层面逐渐抛弃原有的乡土记忆和农村惯习，渴望能在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等方面渐渐融入城市的主流社会之中。与此同时，这种本来由于对自身乡土记忆“刻意性回避”和“污名化的行动”会逐渐形成对城市现代性社会和工业文明的深深依恋，随之而来的是自我内在意识的爆发和觉醒，并成为决定其走出农村的强大内在推动力。对城市的高度认同会在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和精神上产生一种巨大的力量，在一定的程度上减弱其对乡村的依恋，进而乡土记忆被埋藏于身体内部而不易也不愿被激活或提取，并慢慢趋于淡忘(彭远春,2007)。然而“对本地的生活态度”和“对本地的生活满意度”这两个变量也分别通过了模型的检验，其回归系数分别为 0.011 和 0.295，这表明“对本地生活态度”和“对本地的生活满意度”这两个变量对新生代

农民工的市民化水平都产生正向的影响,其中对本地生活态度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的市民化水平要比不满意或非常不满意的市民化水平高出 1.1 个百分点,而对本地生活满意度系数于每增加一分,就意味着其市民化水平便会增加 29.5%。在调查中发现,对本地生活满意度在 5 分及 5 分(满分 10 分)以上的比例达 93.7%,由于新生代农民工正以一种积极的心态努力融入城市之中,因此这对于加快我国城市化的发展和提高市民化水平无疑是有巨大的促进作用。

模型四在模型三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增加了社区参与维度,使得整个模型的 R^2 达到 0.42。从模型四中可以看出,“日常交往情况”和“困难时求助谁”这两个变量通过了模型的检验,然而二者的回归系数都为负值,前者为 -0.124,后者为 -0.177,这表明越是愿意和当地人交往和愿意在困难时求助当地人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的市民化水平就会越高,反之,则会阻碍其市民化进程。这是因为,当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之后,由于在经济条件、生活方式等方面与城市居民有着较大的不同,他们会按照自己固有的“社会等级观念”对周围的人进行分层,从而选择和自己条件差不多的人进行交往;或者当他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首先会想到的也是那些和“自己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的人,只有这样他们才会心里感到“平等”,不至于因为对方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而遭受歧视和排斥。然而这种以“自我分层”为基础的社会观念也造成了一种“自愿性”隔离,从而把新生代农民工和城市居民隔绝开来,使之成为对立的双方,久而久之,敌对代替友好,排斥代替融合,新生代农民工将被长久地排斥在城市之外,更别说实现身份向市民的转化。与此同时,“是否参与社区选举”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水平呈现正向关系,但是在模型中却不显著,未能通过模型的检验。这表明传统以户籍为核心的城乡二元制度,阻碍了新生代农民工制度权利的合法性获得,并进一步限制了他们从“体制外”向“体制内”的转移路径(任远、邬民乐,2006)。政治权利的缺位使得新生代农民工沦为城市的“二等公民”,“用脚投票”并不能获得与城市同等的政治权利,再加上由于实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差异性的分配政策,新生代农民面对着“熟悉”的城市,却始终摆脱不了一种陌生感。作为城市的局外人,由于缺乏相应制度保护,新生代农民工只能摇摆在城市与农村的二元化生存空间里,最终成为一个沉默和失语的群体。这种制度性制约体制的存在,也形成了一种路径的依恋和自我的强化机制,再加上社会个体和制度供给的政府都没有足够的改变现行制度的激励(郭星华,2011:),因此新生代农民工努力实现市民化的种种努力势必会遇到层层阻碍,渐渐丧失实现市民身份转化的努力,并且在某种程度上陷入一种习得性无助或绝望的状态。

六、结论与讨论

实现新生代农民工身份由农民向市民的转化,进而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真正实现,是解决我国当前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关键所在,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最终出路。然而,我国的市民化道路却迥异于西方发达国家,呈现出明显的二元化路径。本文利用国家计生委 2010 年在全国 106 个城市的调查数据,对我国市民化的二元转化路径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目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水平为 50.18%,已经达到了“半”市民化状态,其中居住条件维度的市民化水平最高,达到 59.33%,政治参与维度的市民化水平最低,仅为 32.35%。通过对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发现:经济条件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关键所在,而个体特征、城市归属感及社会参与者三个维度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着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四者之间相互影响,共同决定着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发展水平。

城市化作为工业化深入发展的必然产物,极大的推进了世界各国的文明进程。城市化的发展,不仅是指城市面积的扩大及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而是体现在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这才是衡量一个国家城市化水平高低的主要指标。我国作为“后工业化国家”,其城市化水平要远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而市民化水平则更低。因此,中国必须总结世界各国推动城市化发展的种种经验,并结合自身特有的国情,制定出符合本国城市化发展的方针,从而提高整体的市民化水平。根据现阶段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现状,建议以后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1)传统城乡

分治的制度性分割机制以及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二元格局严重阻碍了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因此进行户籍制度改革是解决我国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实现市民化的关键和前提。通过“渐进型”户籍改革方式,分步骤、分阶段的进行改革,使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都能够获得城市户籍;(2)多维度、全方位的推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就必须明确各方主体之间的权责关系,尤其是要加强当地政府部门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支持力度。例如建立统一有效的劳动力市场,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的居住条件,实行公平、公正的社会保障制度,保障新生代农民工能够共享城市经济发展成果,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人翁感,促进其合理有序的融入城市;(3)要大力实行“智能城市化”和“生态城市化”的发展战略,其核心和本质是“市民化过程”要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突出表现为新生代农民工在市民化过程中不仅能够享受到与当地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待遇,而且能够以一种合理、科学的方式或行为,提高对城市公共物品的使用效率。

参考文献:

- 曾旭晖,2003,《在城农民工留城倾向影响因素分析》,《人口与经济》第3期。
- 郭星华,2011,《漂泊与寻根: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李培林,1996,《流动农民工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社会学研究》第4期。
- ,2003,《农民工: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刘传江,2006,《中国农民工市民化研究》,《理论月刊》第10期。
- 刘传江,程建林,2008,《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分析与进程测度》,《人口研究》第5期。
- 刘传江,程建林、董庭芳,2009,《中国第二代农民工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
- 陆益龙,2008,《户口还起作用吗——户籍制度与社会分层和流动》,《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
- 罗遐,2012,《农民工定居城市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以合肥市为例》,《人口与发展》第1期。
- 马雪松,2000,《论农民工社会角色的转变》,《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
- 梅建明,2006,《进城农民的“农民市民化”意愿考察——对武汉市782名进城务工农民的调查分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11期。
- 彭远春,2007,《论农民工身份认同及其影响因素——对武汉市杨园社区餐饮服务员的调查分析》,《人口研究》第2期。
- 任娟娟,2012,《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水平及影响因素研究——以西安市为例》,《兰州学刊》第2期。
- 任远、邬民乐,2006,《城市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文献评述》,《人口研究》第3期。
- 舒尔茨,1990,《论人力资本投资》,吴珠华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 王春光,2010,《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进程及问题的社会学分析》,《青年探索》第3期。
- 王桂新、沈建法、刘建波,2008,《中国城市农民工市民化研究——以上海为例》,《人口与发展》第1期。
- 王桂新、陈冠春、魏星,2010,《城市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考察——以上海市为例》,《人口与发展》第2期。
- 王毅杰,2005,《流动农民留城定居意愿影响因素分析》,《江苏社会科学》第5期。
- 谢华,2009,《城乡结合部失地农民工城市适应性研究——基于W区的调查分析》,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硕士论文。
- 徐建玲,2008,《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度量:理论探讨与实证分析》,《农业解决问题》第9期。
- 邱彦辉,2009,《农民市民化程度测量指标体系及评估方法探析》,《学习与实践》第8期。
- 张斐,2011,《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人口研究》第6期。

作者单位: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公共管理与法学院
责任编辑:赵联飞